



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

ZHONGGUO GONGCHANDANGREN DE XINYANG

何虎生 著



回顾中国共产党人为信仰而奋斗的历史，
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心灵洗礼！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

何虎生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 / 何虎生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36-8376-4

I. ①中… II. ①何…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员—思想政治教育 IV. ①D26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2585号

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

ZHONGGUO GONGCHANDANGREN DE XINYANG

出版人:郑可

质量总监:张丹飞

选题策划:郑可 王宗琦

责任编辑:何宏贵 王宗琦 邵旻文 乾

装帧设计:张鑫坤

责任印制:陈善军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230601

网址:<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0551)63683012, 63683013

排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5

字数:350 000

版次: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4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前言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没有必要同“番邦”平等交往。中国的民众也在宗法制度的束缚下，男耕女织，自给自足。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是被迫进入近代社会的，而且一开始就从自我迷恋的云端坠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城下之盟的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不败而败”的中法战争、割台赔款的甲午战争、“帝后西狩”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却无法彻底消除个人独裁和军阀干政，袁世凯去世后的中国又沦入军阀混战的深渊。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刚一成立的共产党便立刻投入到实际的斗争之中，领导工人运动，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领导民众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以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为标志，两党的合作达到高潮，国民政府统一长江以南的广阔区域，收回九江和汉口的英租界，国共两党领导中国

人民取得了“反对军阀，除列强”的阶段性胜利。

但不久，国民党向共产党员举起了屠刀，兄弟阾于墙。昔日的战友变成仇敌，因理想和信仰的不同而对立、仇视，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但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杀戮所吓倒，他们从血泊中站起来，开始了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复兴中国革命的艰巨努力。

可是，当日寇入侵，特别是东北沦丧、华北摇摇欲坠之时，被国民党追剿到陕北的共产党和红军，从民族大义出发，与国民党再度联手御侮，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开辟了敌后战场，牵制和打击了大量日伪军，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国土光复之日，即是两党分裂之时。”抗日取得胜利，国土尚未统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本有可能携手中国共产党经过和平谈判，走上民主建国的道路，但蒋介石内战独裁的本质没有改变，于是，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江左江右，国共两党开始了对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的争逐。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民主建政、土地改革，与民主党派合作建国，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建立了，中国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中国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前七年的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初步工业化的任务，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社会最伟大的变革。

回眸百年中国，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近代中国饱受屈辱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屡经挫折而愈挫愈勇？凭什么能够赢得中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并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并走向繁荣发展的道路？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强烈的振兴中华之梦。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世纪巨变的力量之源和之本！他们把世界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整合，从而形成对新民主主义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的美好构想，进而为实现共产主义——人类的真正解放——而奋斗！

“人人平等、人人相亲、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人对大同世界的构想，而“物质和精神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追求。

“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中国古代仁人志士、英雄豪杰的结义口号，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动员和发动群众革命的响亮口号。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拼命的不怕光脚的！”是中国古代草莽的造反誓言，而“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失去的仅仅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成为中国共产党号召工农联合起义的革命宣言。

让我们回到 20 世纪初痛与耻的屈辱年代，回到茫与荒的动乱年代，回到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乃至歌与舞的建设年代，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诗，认识当代中国强劲发展的动力之源！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我的信仰是马列主义！” / 1

- 一 思想上,“跟定马列” / 1
- 二 道路上,借鉴“十月革命” / 12
- 三 组织上,选择中国共产党 / 21

第二章 “打倒列强! 除军阀!” / 33

- 一 真诚合作反遭疑 / 33
- 二 “唤起工农千千万万” / 43
- 三 “革命的黄埔万岁!” / 55

第三章 “只要主义真!” / 66

- 一 无悔的选择 / 66
- 二 潜伏的斗争 / 78

三 井冈山的斗争 / 90

第四章 上山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 / 104

- 一 从武装暴动到土地革命 / 104
- 二 星火耀江南 / 117
- 三 红军不怕远征难 / 130

第五章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 142

- 一 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 / 142
- 二 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 / 157
- 三 到敌人后方去 / 167

第六章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 183

- 一 发展人民武装 / 183
- 二 稳固的抗日根据地 / 196
- 三 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 207

第七章 长缨缚苍龙 / 218

- 一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 218
- 二 战略大决战 / 230
- 三 宜将剩勇追穷寇 / 242

第八章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 254

- 一 和平民主建国 / 254
- 二 携手民主路 / 268
- 三 新中国的诞生 / 280

第九章 敢教日月换新天 / 293

- 一 恢复国民经济 / 293
- 二 彻底反封建 / 312
- 三 走向世界的新中国 / 331

第十章 走社会主义道路 / 349

- 一 踏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征程 / 349
- 二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 363
- 三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 374

后记 / 389

第一章 “我的信仰是马列主义！”

一 思想上，“跟定马列”

★ 嘉道之际的社会危机孕育了经世思潮的复兴。鸦片战争爆发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开始“开眼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随后还兴起洋务思潮，地主阶级开始了“自强”“求富”的探索。

乾隆中后期，当绝大多数中国人陶醉于“康乾盛世”的莺歌燕舞中时，一些未能跻入仕途的下层知识分子，由于对严峻的社会现实有更为直观的感受，他们甚至冒身家性命之危，致书朝廷，建言献策。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年已60的广西生员吴英拦舆献策，列举清朝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如备荒问题、盐政问题、盗贼问题、烟草问题、寺僧问题等，提出自己的一系列见解。但明知理亏的乾隆却以触犯“御讳”为由，将吴英凌迟，子侄五人处死。

然而，进入19世纪，社会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接连不断的白莲教起义、日

益拮据的政府财政、腐败无能的官僚机构和渐趋严重的外来威胁让知识精英们,特别是官僚士人无比震动,强烈的危机意识导致儒家经世思潮的复兴,知识分子开始努力探索摆脱危机的出路。

在批判现实问题上,走在前列的是西北史地学家沈垚,他认为官场的黑暗和士习的颓废是清朝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赠方彦闻序》的作者包世臣,在晚清经世学者中地位举足轻重,他在书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清朝士风的深切担忧,“世远道丧,以剽字为学,剿声为文。其上者乃能钩稽名物,刻镂风云,正己则失要,治人则无功,师友谬说,聪明锢蔽。是故任斯文之重者,有根于性,有成于习,举世竞以俗学以求售。其售者,上得以行其欺罔,下得以肆其朘削,则共以为能”。

龚自珍接过今文经学的时变思想,将它改造为主张社会变革的有力理论武器。他针对清朝人才匮乏的严峻现实,提议加强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写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面对生活困苦的百姓,他在《平均篇》中提出,财富是否均平,不仅关系着人心风俗,也关系着统治的安危;在《农宗》中提出,通过宗法授田实现土地占有的大体平均,从而建立一个“言必称祖宗,学必世谱谍,宗能收族,族能敬宗,农宗与是州长久,泰厉空虚,野无夭札,鬼知恋公,上亦百福之主”的和谐社会。

面对日趋严峻的边疆形势,沈垚也陷入思考当中,朝廷必须改良新疆的吏治,才能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即“欲使西陲无事,必自镇守诸臣能仰体皇上安边柔远之心始”。龚自珍认为应该改变新疆现状,因为传统的羁縻政策已经过时,要在新疆建立行省,“撤屯编户”,和内地一样设立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巡道、提督、总兵等衙门,可惜的是这一主张在当时未被重视。随着边疆危机的加剧,清政府在光绪十年(1884)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在新疆改建行省,从而大大加强了对新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控制。同时注重搜集外国资料,研究西方列国情况的还有姚莹。他在《康輶纪行》中提到:“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

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

嘉道时期,经世思想家们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他们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世界形势,试图寻找出防范和摆脱民族危机的对策。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时为礼部主事的龚自珍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禁绝鸦片,防止白银外流。他建议林则徐讲求火器制造,“以重兵自随”,“多带巧匠,以便修整军器”。林则徐在使粤和督粤期间(1839—1840),渴望了解“夷情”,“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出探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人,甘心讨好,将英吉利书籍卖与中国”。他所要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是“制造船炮”;他主张开矿,“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同时,他组织人员翻译编纂了《四洲志》《各国律例》《华事夷言》等资料。

《四洲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翻译西方历史地理的志书,主要译自1836年英国学者慕瑞(Hugh Murray)编辑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一书。其中有对沙俄自彼得大帝称霸后向外四处扩张历史的较为详细的介绍,并提到沙俄侵犯我国黑龙江地区被击退的史实。《四洲志》对后来探求新知识的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林则徐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与林则徐有着深厚友谊的魏源,在接受林则徐所赠的《四洲志》和其他翻译资料的基础上,又搜集各种中外资料,经过增补和整理,写成了五十卷的《海国图志》。这本书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地理,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在自述编纂动机时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译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

魏源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他强调的“长技”,并不仅仅指武器装备,还包括军事制度等多种内容,即“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在魏源看来,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知识,不能只局限于军事器械,对民用器械也应学习。“今西洋

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旋辍之有？”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不仅为后来洋务派思想的形成以及洋务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传到了国外。在日本，《海国图志》受到维新志士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但这一活动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新思想的代表大多是封建上层官僚，他们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表面——器物（坚船利炮）层面上，并没有形成向西方学习的强大思潮，而仅仅局限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的极少数人，更没有进行一定规模的政治实践。

晚清思想家冯桂芬痛感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一方面，他著书立说，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一系列政论中，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对西方国家要“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另一方面，他还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培养西学人才。他“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作为洋务指导思想，这不仅成为从经世到洋务的桥梁和兴办洋务的纲领，也成为后来流行一时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的滥觞。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外有英法联军入侵北京。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为挽救清王朝，清朝中央的恭亲王奕訢和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崛起的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等口号和思想。后来，他们进一步提出“制洋器”“采西学”的“自强”口号，主要内容是兴办军事工业、筹划海防，逐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从19世纪70年代起，围绕难以解决的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问题，在“必先富而后能强”的“求富”口号下，洋务派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

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开设了一批以翻译、出版、科技、留学为内容的新式学堂,迈出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第一步。

但是洋务运动只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军事技术,而统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没有变化。教育的变革不敢废除腐朽的科举制度,压制了人才的成长,这些都导致政府的机械改革有起点而无进步,同时也决定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命运。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尽管清朝在战场上最终取得胜利,但还是落了个“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结果。到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的北洋舰队遭受重创,地方实力派的民团一败再败,再加上主持朝政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政治斗争内耗,更使军事实力本就不堪一击的清朝军队一败涂地。

★ 资产阶级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实现君主立宪、变法图强,但遭到封建守旧官僚的抵制。时代呼唤革命,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思想和“民族革命”口号在全国风起云涌。

到19世纪90年代初,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开始在广州办万木草堂,宣传维新思想。他撰写的《新学伪经考》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统治者恪守祖训、反对变法的理论基础,并借经学的外衣,以《孔子改制考》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否定君主专制统治,宣传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对封建顽固势力造成了有力的冲击,这一思想被称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火山大喷发”。他的学生梁启超发表的《变法通议》则宣传伸民权、设议院、变法图存的思想,抨击顽固派的因循守旧以及封建专制制度的危害。严复还撰文指出:封建君主皆为“大盗窃国”,宣扬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王侯将相是人民的公仆。

与洋务思想相比较,他们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希望通过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富国强兵。但两派也有许多不同点:首先,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阶级

利益,有着不同的阶级基础,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洋务派主要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其次,他们向西方学习的侧重点不同,洋务派只引进西方技术而反对政治改革,维新派不仅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还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所以,两派的根本分歧在于“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资产阶级维新派同顽固势力展开了论战,内容是“要不要变法维新,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同封建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高潮。

1898年,光绪皇帝实行戊戌变法。但因为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的反对,在地方上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施行,大多数官员只是将变法维新的章程放在案头了事。最终,戊戌变法以光绪帝被囚瀛台和参与变法的“戊戌君子”被杀而惨败告终。地主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联合提出“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兴民权、提倡新学”的思想,是中国近代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特别是此时期内建立的京师大学堂,更成为国内民众接受新思想的起源,起到了启蒙民众思想的作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20世纪初,《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在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投资的刺激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有所发展。但是,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仍然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限制和阻碍。为了给民族资本主义开辟独立发展的道路,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要求。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了革命团体兴中会。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不断建立和各地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资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不断壮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思想、组织、阶级方面逐渐成熟。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于日本东京成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确认机关刊物为《民报》。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拥有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建立了从中央本部到各地支部的组织系统。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政治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第一,民族主义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方面指推翻清朝的统治,废除清朝推行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另一方面指独立,即推翻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暗寓了反帝意愿。它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爱国者实现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是20世纪初反清与反帝的民族矛盾的集中体现。

第二,民权主义提出的“创立民国”,是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的核心,是政治革命的根本。资产阶级要进行政治革命,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防止封建君主制复辟。民权主义反映了尖锐的阶级矛盾,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的迫切要求。它与民族主义紧密相连,从理论上解决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夺取与建立政权的问题,推动了革命的发展。但是它仅要求推翻封建专制政府而不是消灭整个地主阶级,因此反专制是不彻底的。

第三,民生主义提出的“平均地权”,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核心,其目的在于消除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孙中山希望通过“核定地价”、征收土地税的办法逐步向地主收买土地,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建立资本主义的土地国有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把解决土地所有制与发展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革命纲领,它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希望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农民的同情。但它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也不可能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总体而言,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充分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发展,是一个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但是,三民主义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也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因此,三民主义不是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革命建国、民主共和的旗帜，为推翻清朝的统治、结束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由变法维新转向保皇，成为保皇派，维护清朝专制统治，并与革命派进行了论战，内容主要围绕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和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等问题进行。这次论战的实质是一场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新军工兵第八营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率领士兵打响了革命起义的第一枪。12日，光复了武汉三镇。武昌起义获得了成功，革命党人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旧军官黎元洪任都督。

一批投机官僚和立宪派人物跟着也进入了军政府，革命潜伏着失败的危机。武昌起义后，陕西、山西、江西、浙江以及福建由革命党和立宪派、旧官僚联合掌权；江苏、广西等“和平光复”，各省都抚称都督并掌权；四川、湖南、贵州三省均由立宪派掌权或立宪派、旧官僚武力从革命派手中夺权；革命党人能够控制政权的，只有广东、上海、安徽、江西四省。可见，武昌起义之后，一方面是清朝统治土崩瓦解，另一方面是封建思想并未因此根本动摇。

★ 中华民国阻挡不住执政者的“独裁梦”和“皇帝梦”，北洋军阀的混战争斗成为残酷的现实。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会怎么样？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探索、争论，他们在指导思想上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和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